

倪祥妍 ◎著

日本小说家与 郁达夫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倪祥妍 ◎著

日本小说家与 郁达夫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小说家与郁达夫/倪祥妍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301 - 23278 - 1

I. ①日… II. ①倪… III. ①小说研究 - 日本 - 近代 ②郁达夫
(1896 ~ 1945) - 小说研究 IV. ①I313.074 ②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3077 号



书名: 日本小说家与郁达夫

著作责任者: 倪祥妍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3278 - 1/I · 268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53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苏州大学 方汉文

辛丑年初,余应长崎大学之邀,欲东渡讲学,倪祥妍博士的学位论文《日本小说家与郁达夫》整理甫就,嘱余以为嚆矢。余身为其导师,自然是义不容辞。

然而另有一事亦令余必得有一文论中日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比较文明学会主席、西密西根大学教授安德鲁·塔戈斯基(Andrew Targowski)与日本比较文明学会主席、也是国际比较文明学会终身主席伊东俊太郎教授,多次与余谈到东亚文明自身与东亚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也是由比较文明研究领域的中、美、日三方的交流,所谈的又是三个文化系统之间的历史关系,自然要有文章才能说清。

于是借题发挥,将余对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关系到第三方即古代与中国的“西方”的关系,作一最简要论述。

在《比较文明史 新石器时代至公元5世纪》与《比较文化学新编》等著作中,余尝论及中日文化关系。从文明体系而言中日同属于亚洲太平洋文明体系,这是世界八大文明体系之一。这一文明体系从欧亚大陆的东北端近北极的东北亚陆地开始,经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是世界最广袤最古老的文明体。从文明交往而言,自两万年前北上的黄色人种跨越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之后,这一地区的文明交往特别是海上交往从来未断。中日之间的交往则最为频繁,其程度超越了陆地上的中印之间交往,中印之间由于喜马拉雅山所形成的障碍,一直没有大的交通形成。而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其历史之久令人咋舌。在欧洲的大型机帆船传入之前,两国之间的渔民与商人们已经凭借小木船在海上有上千年的交流史了,东吴的船民与日本的渔

户经常被海上风浪冲到对方的港口。

文化交往并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或是物质交换,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思想宗教与文学艺术的交流,而中日之间交流的历史有一个特点: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全都与东西方文明大交流有关。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流模式差异:近取与远取。

唐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中,主流是中华文明的创造如文字、语言、唐诗、儒学等,但同时也有佛经。而佛经是从古代的“西方”印度进入中国,然后又经中国进入日本。而佛经进入中国的过程又是先经过西域各国才进入中国,以中国与西域的佛经交流关系而言,西域比印度从交通上而言更近,属于“近取”。魏晋时代的佛经主要是西域人鸠摩罗什等人翻译与传播,到了唐代,中国人不满足于西域各国的佛经的“二倒手”,决心要翻越雪山到印度取经,经过法显、玄奘等人的艰苦行程,终于将梵文真经取回了大唐。这就是所谓的“远取”。

以余之见,“远取”与“近取”都是由历史阶段所决定的,最初华梵之间无交通,距离中原近的西域僧人东来传经是必然的。但是,就佛经与佛教理论而言,远取与近取的理论高低却有天壤之别。

远取的梵经是真正的理论精品,这种理论经过翻译与再创造之后,才能成为中国佛学的精华。以这个层次而言:“近取”得益快,而“远取”才是历史创造的真正动力。

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完全是古代佛经交往的历史再现。

晚清到民初,中国从日本获取源于西方的现代思想,这就是“近取”,相当于魏晋时从西域获取佛经。

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大批回国,西方现代化思想如潮水一般涌入。这是中国从欧美直接获得现代化思想与学术,就是“远取”。

余同样认为:中国从明治维新的日本“近取”的现代化思想得来最早,发挥作用快,但也有区别,这种思想是日本化的西方思想。

而中国从欧美直接获取的现代观念,则来自于本源,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等思想家,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都是真金一般。“远取”与“近取”犹如昆山顾炎武所言:要采铜于山,不要买铜于市。章太炎等人也赞同此说,铍碎铜钱来制铜,所得必然不纯。所以在思想文化的借

鉴上,余赞同“远取”,以为采铜胜于买铜。

此为说一也。

此外,关于文学则另有一说:中国新文学运动诸子中留学日本的作家成就相当大,如周氏兄弟、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坚。如果要研究其中的原因,可能与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在文化传统、思想情感与习俗方面更为接近有关系。

因此,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研究中日文学交流的意义对于现代和当代文学的作用更为直接,以余之见,这也可能是倪祥妍博士论文的价值所在。

郁达夫小说以其绵密沉郁的风格、纤秾而饱含直觉的描绘为当时的青年所激赏,其与日本作家的联系也就更为引人注目。东吴与日本更是隔水相望,历来研究与留学日本的学人相当多,余所指导的博士生中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更是占了不少。倪祥妍博士多年学习日语,在攻读博士期间,曾利用在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访学研究的机会,广泛搜集日文资料,获取了大量国内所不多见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其论文中许多章节,不但对于普通读者,就是对于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专家而言,也感到宛如一股清新的风吹来。这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多位评阅论文的日本文学专家的感触。

余指导博士生论文,材料是第一位的,特别是原文资料,研究欧美相关作家的一般都到过英美或加拿大等国的大学留学,研究日本文学关系的,一般都到过日本研究或是教学,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是了解所研究国家的文化与生活,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其二是可以获取非研究资料,包括与所在国的学者进行交流。所以我们特别要感谢教育部对这些博士论文作者所提供的高校教师出国进修与访学的机会,近年来余所指导的博士生中相当多的人利用这种机会提高研究水平,完成了博士论文。

当年倪祥妍带着从日本大学复印和拷贝的大批资料归来后,以异常的勤奋与钻研精神,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总结:丰富的原文资料、理论分析的成功得自于勤奋努力。

余何赞一辞哉!唯愿倪祥妍博士继续努力,在其教学与科研中再创新成就。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郁达夫留学时期的日本文学语境	(15)
第二章 宣泄与暴露:田山花袋与郁达夫	(27)
第一节 形似的“性苦闷”的抒写	(30)
第二节 相似的文学主张	(49)
第三节 模仿批评的对象	(64)
第三章 佐藤春夫与郁达夫的复杂关系	(74)
第一节 佐藤春夫的小说对郁达夫的影响	(80)
第二节 佐藤春夫的艺术观对郁达夫的启示	(88)
第三节 难以恢复的友情	(99)
第四章 塑造“零余者”的葛西善藏与郁达夫	(118)
第一节 葛西善藏影响郁达夫的现实因素	(121)
第二节 表象的相似	(138)
第三节 潜在的差异	(142)
第五章 作为唯美书写者的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	(148)
第一节 两位作家的唯美主张	(151)
第二节 性受虐和性施虐的书写	(161)
第三节 恋物癖:恶美的书写	(171)

第六章 书写人道之爱的志贺直哉与郁达夫	(185)
第一节 因家事“不调和”而为文	(192)
第二节 关于人道主义之爱的书写	(203)
第七章 取材花街柳巷的永井荷风与郁达夫	(215)
第一节 共同涉及的题材:花街柳巷	(220)
第二节 对社会弊端的揭露	(230)
结语	(238)
主要参考文献	(246)
后记	(252)

导 论

郁达夫是1913年随长兄郁曼陀一起东渡日本的,直到1922年才回国,近10年的留日生活,加深了郁达夫弱国子民的体验,也使得他深受日本文学的熏陶及西洋文学的影响。他自己曾这样回忆道:“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就是现在,于吃饭做事之外,坐下来读的,也以小说为最多。”^①一同留学、回国后又同为创造社成员的郑伯奇在谈到郁达夫读外国文学的情况时也回忆说:

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专读一个作家,也不专攻一国文学,凡是名著杰作,他大都阅读。甚至初露头角的作家,或者不大出名的作品,只要兴趣投合,他也津津乐道。他的兴趣所在似乎是浪漫气息浓厚的、富有抒情味的、艺术性较高的作家。譬如帝俄时代几位大师中,他似乎喜爱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对于其他国家的作家,情况也大致相同。由于他精通英文,他对于英国文学作品读的更多,了解的更加深广。他的英国文学知识相当丰富、渊博,但他的兴趣似乎偏重于十九世纪末期的作家。他喜欢王尔德、也好读道生、汤姆生等人的诗,而王尔德的艺术对他的影响较深。他与日本小说家的交往以及对其作品的关注,通过日记、书信的阅读都可以见到。其中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人的小说是他比较喜爱的。1920年他通过田汉的引荐拜见了文坛新秀佐

^① 郁达夫:《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

藤春夫。他对于自然主义文学一般不大爱好,但在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中,他自称葛西善藏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他的那种深刻的自我分析和他喜欢采用的独白式的手法,的确和葛西善藏有点相似。不过他的清新流丽的笔调,和葛西的那种繁重琐碎的自然主义文体相反,而是接近于王尔德艺术派的文风。总之,他的外国文学的修养非常丰富,因而他接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①

郑伯奇在此明确指出郁达夫喜欢谷崎润一郎^②、佐藤春夫^③的小说,郁达夫自叙葛西善藏^④对自己有影响等等,但作者把葛西善藏称为自然主义作家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葛西善藏没有参与过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宣传工作和文学创作,仅在1912年和几位同人创办过杂志《奇迹》而已。不管是目前能看到的日文版的葛西善藏传记类材料还是日本文学史的有关书籍,抑或是中文版的《日本文学史》(西乡信纲著)或《日本现代文学史》(吉田精一著)、或《日本当代文学史》(陈德文著),从没有哪一个著者将葛西善藏称为自然主义作家的,仅将他称为私小说作家。我们通过郁达夫的日记、书信或评论也可以看出:郁达夫留日时对田山花袋^⑤、葛西善藏、佐藤春夫、永井荷风^⑥、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⑦几位作家就很关注,跟佐藤春夫有着很深的交往,即使回国后也非常关注这些作家。他曾自述道:“在日本现代的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他的作品中的第一篇,当然要推他的出世作《病了的蔷薇》,即《田园的忧郁》了。其他如《指纹》,《李太白》等,都是优美无比的作品。最近发表的小说集《太孤寂了》,我还不曾读过。依我看来,这一篇《被剪的花儿》也可说是他近来的最大收获。书中描写主人公失恋的地方,真是无微不至,我每想学到他的地步,但是终于画虎不成。有一次何畏对我说:‘达夫!你在中国的地位,同佐藤在日本的地位一样。

① 郑伯奇:《忆创造社》,《郑伯奇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9—1250页。

② 谷崎润一郎(たにざきじゅんいちろう,1886—1965)日本小说家。第五章将论及。

③ 佐藤春夫(さとうはるお,1892—1964)诗人、小说家。第三章将论述。

④ 葛西善藏(かさいぜんぞう,1887—1928),小说家。第四章将论及。

⑤ 田山花袋(たやまかたい,1871—1930),小说家。第二章将论及。

⑥ 永井荷风(ながいかふう,1879—1959),小说家。第七章将论及。

⑦ 志贺直哉(しがなおや,1883—1971),小说家。第六章将论及。

但是日本人能了解佐藤的清洁高傲,中国人却不能了解你,所以你想以作家立身是办不到的。’惭愧惭愧!我何敢望佐藤春夫的肩背!”^①

他也写过文章论及自己对日本文化及日本文学的认识,如在其散文《日本的文化生活》中,郁达夫就对日本的和歌与俳句作过极高的评价:“先以他们的文学来说罢,最精粹最特殊的古代文学,当然是三十一字母的和歌。写男女的恋情,写思妇怨男的哀慕,或写家国的兴亡,人生的流转,以及世事的无常,风花雪月的迷人等等,只有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今古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了。至于后来兴起的俳句哩,又专以情韵取长,字句更少——只十七字母——而余韵余情,却似空中的柳浪,池上的微波,不知所自始,也不知其所终,飘飘忽忽,袅袅婷婷;短短的一句,你若细嚼反刍起来,会经年累月的使你如吃橄榄,越吃越有回味。”^②日记中写到阅读日本作家小说或相关评价的地方不下十处:“晚上读谷崎润一郎氏小说《痴人之爱》”^③;“午前在床上,感觉得凉冷,醒后在被窝里看了半天《痴人之爱》”^④;“午前雾大,至十二时后,始见日光。看葛西善藏小说二短篇,仍复是好作品,感佩得了不得。昨天午后从街上古物商处买来旧杂志十册,中有小说二三十篇。我以为葛西的小说终是这二三十篇中的上乘作品”^⑤;“回家来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夜膳前喝完了两瓶。读了两三篇日文小说”^⑥;“午后因为天气太好,不知不觉,竟走了出去,又买了一本《新潮》新年号,内有葛西善藏的一篇小说名《醉狂者之独白》,实在做得很

① 郁达夫:《海上通信》,《炉边独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② 郁达夫:《日本的文化生活》,《郁达夫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158页。

③ 郁达夫:《芜城日记》(1921年11月3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④ 郁达夫:《劳生日记》(1926年11月4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⑤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6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⑥ 郁达夫:《村居日记》(1927年1月7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好”^①；“读日本作家谷崎精二著的《恋火》，系叙述一个中年有妻子的男子名木暮者，和一位名荣子的女人恋爱，终于两边都舍不得，他夹在中间受苦，情况和我现在的地位一样”^②；“晚上一晚睡不着，看了一篇日人宇野浩二的小说”^③；“打算写一点东西，可是滞气又来，难动笔矣。读田山花袋之《缘》，为《蒲团》之后集，前数年，曾读过一次，这一回是第二次了，觉得不满之处颇多，不及《蒲团》远甚”^④。

1933年，钟敬文先生在回忆郁达夫的一篇文章中，写到郁达夫曾经向他介绍说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卍》写得很好，建议他有空看看等等。^⑤ 1936年12月18日，郁达夫再次访问东京，其间曾在致王映霞的信中盛赞志贺直哉“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大可比得中国的鲁迅”。“一个具备着全人格的大艺术家”，“文字精妙绝伦”，其作品“篇篇都是珠玉”^⑥，是个“良心不昧的人”^⑦。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1939年，郁达夫仍不改初衷，将志贺直哉视为有节操的少数日本作家中的典型。他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中写道：“到了现在，就是到了兽欲横行，正义理智完全泯灭的现在，他们也只严守着沉默，而仍不失他们的故态。像白桦派的志贺直哉，浪漫派的谷崎润一郎等，就是这些少数人的代表。”^⑧

通过郁达夫的小说及文论、随笔等的阅读，笔者发现郁达夫的早期小说

① 郁达夫：《穷东日记》（1927年2月12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② 郁达夫：《新生日记》（1927年2月27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③ 郁达夫：《新生日记》（1927年3月12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④ 郁达夫：《避暑地日记》（1934年7月24日），《郁达夫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页。

⑤ 钟敬文：《郁达夫先生的印象》（1933年），《众说郁达夫》，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⑥ 郁达夫：《致王映霞》（1936年12月18日），《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55页。

⑦ 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郁达夫文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⑧ 郁达夫：《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作家》，《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虽然也带有 19 世纪末欧美文学的颓废色彩,但更多的是日本自然主义的痕迹、唯美派的倾向。其文学主张和小说文本,都表现出与田山花袋、佐藤春夫、葛西善藏、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志贺直哉等多位作家相似的地方,所以笔者认为以上几位作家对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影响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进而希望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影响—接受研究的方法对其作品和相关文论进行比较分析,探究郁达夫小说中的日本元素。

二

关于郁达夫和外国文学的关系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研究,也有不少相关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多是以短篇论文的形式出现,或是在编著或专著中有部分章节涉及。

日本国内可查的最早有关郁达夫研究的资料是竹内好先生于 1933 年所做的一篇名为《郁达夫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该论文对郁达夫的经历、著作、年表都作了考证,并以日本学者的眼光把郁达夫的前期创作(1927 年以前)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研究,他先给郁达夫取名“苦闷的诗人”,指出郁达夫离开日本之前的作品写出了“人间苦”,即性苦闷和因身处日本而带来的屈辱感;回国之后到 1926 年 3 月赴广州之前所写的文章都反映了因生活无着而导致的“社会苦”;从 1925 年到 1927 年间郁达夫还写过反映中国社会动荡、时代变迁的“时代苦”的文章。日后竹内好先生虽成为日本赫赫有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但由于此篇文章成文于学生时代,所以有些观点还不很成熟,比如“社会苦”、“时代苦”的命名就有些牵强和交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一直未与读者见面,直到 1982 年筑摩书房在出版 17 卷本的《竹内好全集》时才被收录。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是竹内好先生比较早地发现了郁达夫前期作品中有日本自然主义的痕迹,即《沉沦》与田山花袋的《棉被》有相像之处,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却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伊藤虎丸先后发表过《郁達夫の処女作について——その主題と方法をめぐる二、三の比較的考察——》(《汉文学会会报》1959 年 6 月第 18 号)和《〈沈淪〉論——日本文学との関係より見たる郁達夫の思想 = 方法について——》(本篇分为两部分分别刊登在

《中国文学研究》1961年4月第1号、1964年12月第3号上),后来两篇论文经修改后以《郁達夫と大正文学——日本文学との関係より見たる郁達夫の思想=方法について》为题收录到作者自己、祖父江昭二、丸山昇主编的《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汲古书屋,1986年版)一书,作者指出了郁达夫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都受到日本大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佐藤春夫文学的影响,对《沉沦》和《田园的忧郁》的比较文字较多。这部分内容之后也被部分选入《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一书(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其后由我国学者刘平根据日本《和光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2期(1978年3月出版)上所发表的伊藤虎丸在一次“佐藤春夫与中国”的座谈会上所作的纪实发言所译的《佐藤春夫与郁达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和潘世圣先生根据伊藤虎丸主编《创造社研究·创造社资料别卷》(日本亚洲出版社,1979年初版)中的相关内容所译的《创造社和日本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3期)基本上保留了伊藤虎丸60年代所发表的两篇论文的观点和资料。铃木正夫也写过《郁达夫与日本文学》(《复旦学报》1984年第6期),主要言及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之间友谊的建立及终结,也谈及《沉沦》和《田园的忧郁》的相似之处。1975年小田岳夫出版的专著《郁達夫伝——その詩と愛と日本》(中央公论社),是根据郁达夫的几篇自传材料和留学时郁达夫所交往过的几位日本友人的采访材料写成的传记,其中也涉及《沉沦》和《田园的忧郁》的比较分析,指出《沉沦》和《田园的忧郁》在叙述心境、描写忧郁症、引用外国诗人的诗和景物描写方面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指出两位作家所写“忧郁”之不同,其根源在于中日国情的不同。他的这一观点一直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沿用。

杉村安儿子根据2004年秋天祖父江昭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两次演讲报告所译的《日中两国文学家的“交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一文介绍了佐藤春夫和郁达夫的交往经过,虽然内容上稍显单薄,但在有限的篇幅内对佐藤春夫的批判还是比较犀利的。对中日战争之后佐藤春夫的言行中有关郁达夫的论述较为详细的是铃木正夫先生在日本国内发表的《郁达夫と佐藤春夫——佐藤春夫の放送原稿〈旧友に呼びかける〉に即して——》(《横滨市立大学論叢人

文科学系列》,2002年),对佐藤春夫的批判也比较深刻。山田芳明发表的《佐藤春夫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女子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12月)一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佐藤春夫跟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交往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涉及鲁迅、田汉、郁达夫、徐志摩等人,对佐藤春夫战前战后的表现的评价比起祖父江昭二及铃木正夫来不免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通过日本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研究资料检索系统检索,笔者发现自1948年至今,日本国内唯一一篇对葛西善藏和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的是桑岛道夫的《葛西善藏と郁达夫——〈哀しき父〉〈子をつれて〉と〈菫蘿行〉の比較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游学》2000年第13号),作者指出了郁达夫的《菫蘿行》所体现出来的私小说家葛西善藏的文学的特点。这个时段内涉及田山花袋和郁达夫的研究论文只有寥寥两篇,一篇是中国学者李丽君用日文撰写的《郁达夫の文学観について——郁達夫と田山花袋との比較を中心に》(《比较社会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分析了郁达夫文学观形成过程中所受到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主要是田山花袋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但没有涉及作品比较;另一篇是大东和重的《“自意识”の肖像——田山花袋〈蒲団〉和郁達夫〈沈淪〉》(《比较文学》第45集,2000年第3期),论及两位作家的两篇作品客观地抒发了主人公的感情和感伤,并说明主人公都有很强的“自意识”。同样是在这个时段内,日本只出现一篇有关志贺直哉对郁达夫小说创作影响的文章,那就是大东和重的《郁達夫における志賀直哉の受容——自伝的文学とシンセリティ》(《近畿大学語学教育部纪要》,2006年),正如题目所示,主要谈及郁达夫接受了志贺直哉的自叙传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诚实性、正直性的影响。通过调查得知这三位日本作家和郁达夫的比较研究在日本国内也没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我国,因为郁达夫早期作品中性描写的原因,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都把郁达夫当作颓废作家来看待,以致他在文学史上一直未得到公正的评价,加之中国又经过几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竟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两次出现郁达夫研究的空白期。第一次空白是萧乾于1935年11月4日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过《评〈出奔〉》之后到郭沫若于1946年9月30日在《人物杂志》第3期上发表《论郁达夫》为止的十年,第二次

空白是1962年8月6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郁达夫诗词抄〉序》之后到1980年1月朱靖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一个矛盾而易遭误解的作家——略论郁达夫》一文为止的近十九年。这两段加起来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国内竟无人从事郁达夫研究,其原因当然是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的。由于中日战争,也由于郁达夫最终死于日本宪兵之手,所以20世纪80年代之前近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国内更鲜有学者敢于从事郁达夫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界也变得活跃起来,加之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所以郁达夫与日本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成果也不断增多。涉及郁达夫与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葛西善藏、志贺直哉等作家的比较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集也相继出现,主要有:

许子东先生的专著《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中有一篇论文《郁达夫与日本》,主要论述郁达夫本人及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对日本又爱又恨的复杂关系,其中也论述到郁达夫所受的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主要言及《沉沦》所受的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的影响。由于这部分内容最初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写作时间已是30年前,也因为作者许子东先生认为郁达夫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较大,所以对郁达夫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有更多的关注。

赵乐娃先生等主编的《中日比较文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中收有刘立善先生所写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以〈田园的忧郁〉和〈沉沦〉为中心》一文,指出了郁达夫推崇佐藤春夫,是因为《田园的忧郁》等作品所营造的寂寥、阴郁、梦幻、妄想等世纪末感伤美学情调及文中所酿出的“忧郁”的氛围持有同感,指出《沉沦》在人称使用上、自然景物描写方面和《田园的忧郁》存在类似之处。同时也指出了两篇作品的不同之处,如《田园的忧郁》的作者和主人公合体后共同活动于作品之中,而《沉沦》的主人公和作者并非同一人,且两篇作品的取材和主题及主人公忧郁的性质都有所不同。

刘立善先生的专著《日本白桦派与中国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中有一章对志贺直哉和郁达夫两位作家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

其小说的“自叙传”色彩及作家的文学观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也指出了在忧国忧民意识上两位作家的不同之处。内容大约有一万多字。

张福贵、靳丛林先生合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有《日本私小说与创造社小说——以葛西善藏与郁达夫的小说主题为中心》一章^①,分析了郁达夫之所以受葛西善藏影响的几个原因。虽然字数不多,却给笔者以很大启发。可以说笔者就是沿着张先生设定的几个原因去阅读相关文献、进一步探究这种“影响”的虚实的。

王向远先生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从“思潮比较论”、“流派比较论”、“文体比较论”、“创作比较论”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到的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其中涉及中日自然主义的不同命运的分析比较、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研究、私小说文体对郁达夫等留日作家的影响研究等,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现代作家在受到日本文学思潮或作家的创作实践影响的过程中自己的创新之处。是迄今为止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研究专著。

刘久明先生的专著《郁达夫与外国文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论及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日本文学对郁达夫的影响,在关涉日本文学方面主要论及郁达夫与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的关系。其中谷崎润一郎的论述从内容方面来看还较为单薄。如果把他著作中有关佐藤春夫的部分和发表于2001年第5期《常德师范学院学报》上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结合起来看的话,倒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前期佐藤春夫和郁达夫的交往以及文学上的影响。

肖霞女士的专著《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论及五四新文学是借助日本之桥发展起来的,其中也论及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及世纪末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

应该说在论及佐藤春夫对郁达夫的影响时,国内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受

^① 最早是张福贵先生在参与孟庆枢主持的国家项目“日本近代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的成果,1992年,该成果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